

●徐 蜀

司马迁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贡献

ABSTRACT By analysing *Shi Ji* by Sima Qian, the author thinks it is not only a classic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but also ha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in ancient China. 8 refs

KEY WORDS Sima Qian. *Shi Ji*.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in Ancient China

CLASS NUMBER G256.1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史学和文学名著,而且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隋书·经籍志》总序在论述《隋志》产生的渊源时就提到了这一点。《序》曰:“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所谓“王、阮志、录”,指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均是古代目录学名著;而“马史”(《史记》)、“班书”(《汉书》)却是纪传体史书。如果说《汉书》中有艺文志,尚可为《隋书·经籍志》提供依据的话,那么《史记》中则无此类目,而《隋志》作者仍然将它列入其中。这说明纪传体史书与古典目录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看,也确实如此。《史记》是纪传体的开创之作,又产生于中国第一部正式的目录《七略》之前,所以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首先谈谈《史记》在图书分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般来说,图书分类产生于事物与学术思想的分类,这正如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所指出的,“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

有关类别的概念起源甚早。《易象》云:

“君子以族类辨物”。《易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乾》云:“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以其类也”。《墨子》、《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著作中,也出现了讲究“知类”、明辨“同类”、“不同类”、区分“共名”、“别名”、“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论述。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事物的分类已有相当的认识。对学术的分类也已初见端倪。例如《论语·先进》篇,将孔子所授之业分为四科,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孟子将学术分为杨、墨、儒三家,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分百家之学为七派并论其异同得失,将学术分类的思想与实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对事物及学术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类,并使之与图书分类结合为一体,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是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历史著作。司马迁著史的动机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对历史进行全面的总结。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不仅要搜集、鉴别大量的文献资料,还要将其组织起来,编成一部既能客观反映社会发展的面貌,又便于人们阅读和理

解的历史著作。这样,先秦时期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史书编撰形式已不适合需要,于是司马迁首先对史书体裁进行了改造,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纪传体。纪传体与早期流水账簿式的编年体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对人物、事件及文化学术等分门别类。而且,只有在分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纪传体这一综合性史体的内部体例。司马迁的这一改造,已高度涉及了目录学范畴中的分类问题。对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曾给予肯定的评价,说:“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至司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异观”。他还举例说:编年体“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琐碎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以固例迁)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刘知几上述评论,一方面指出了“区分类聚”在扩大史书记述范围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史记》等纪传体史书对目录学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以下我们再对《史记》的具体分类情况作一简要分析。

司马迁根据叙述对象和史书表现形式的不同,设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实际上,《史记》一书中的类别远不止于此。例如书分为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列传中除一般的人物传记外,又有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类传。以上各类,在书中均有明确的类名。其他散见于各篇之中有关“区分类聚”的内容还有不少。如果我们将《史记》与产生于其后的《七略》作一比较,司马迁在分类学上的卓识及贡献就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七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对图书进行系统分类的目录,其中大部分类目或有关内容都能够在《史记》中找到踪迹。如《七略》有《六

艺略》,《史记》则有《儒林列传》(还有孔子世家与之相辅),对《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进行学术分类,并对其主要传人、学术思想和著作做了介绍;《七略》有《诸子略》,《史记》则在《太史公自序》中以“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对诸子中最重要的六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的分类情况、学术观点及评价做了详细的叙述;《七略》有《兵书略》,《史记》中则有《律书》(实为“兵书”,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并作说明:“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七略·数术略》中设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史记》中则有《天官书》、《历书》、《封禅书》、《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七略·方伎略》中有医经、医方二类,《史记》以为“扁鹊言医,为方者宗……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专言医家;《七略·诗赋略》的五个小类中,有四种为赋,而司马迁对赋的特殊价值与作用亦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故设《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以统赋类。

此外,有关《史记》与《七略》在文献资料分类等方面的关系,近代学者梁启超早有认识并曾予以论述,他说:“《史记》以极复杂之体裁混合组织,而配置极完善,……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网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诗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伎略》之属也;如龟策、

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

司马迁对分类学的见解和贡献,从以上所举已略见一斑。但他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对封建史学体系的建立和分类上。

所谓封建史学体系,从文献角度来说,指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之书。中国史学虽然产生很早,但在古典目录学中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却是较晚的事情。像《七略》、《汉书·艺文志》等早期的目录,史书均隶属于经部的春秋类。此后郑默、荀勖作《中经》、《新簿》,史籍才得以独立成类。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史部体系的基本确立,完成于梁阮孝绪的《七录》和唐初魏征等人所撰之《隋书·经籍志》。《七录》第一次在部类之下划分细目。其《记传录》(即史部)分为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十二类,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史籍发展的状况。《隋书·经籍志》史部在此基础上稍加修改,遂成规范,沿至清末,无大变动。

史部目录的确立,孝绪之功不可没。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史部目录的最终形成,亦得益于《史记》以来纪传体史书的蓬勃发展。这是因为:其一,目录学的发展,取决于所记述学科的发展。例如史部目录,正是由于《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推动,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编撰的繁荣,才使目录学家有所依据。其二,纪传体史书的“区分类聚”为史部分类奠定了基础。前一点属史学研究的范围,且不细论。现仅就后一点予以说明。

司马迁肇始于前,班固、范曄等一大批史学家踵武其后。纪传史的内部体例不断改进,至南北朝时期已基本完备,为史部目录的分门立类提供了参考。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其类目的设置大多能在《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等纪传史中找到它们的渊源。

如职官类源于《史记》的诸侯、功臣、将相名臣等年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和《后汉

书》的《百官志》;刑法类源于《汉书》的《刑法志》;杂传、杂史类源于《史记》等书的列传和类传;地理类源于《史记》的河渠书和《汉书》的地理志;霸史类源于《东观汉记》的《载记》;仪注类源于《史记》的《礼书》和《汉书》的《礼乐志》;史评类源于《史记》的“太史公曰”及诸史的“论赞”等等。这一点清代学者早已认识到了,并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中明言:“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日正史(纪传体),大纲也。次日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抄,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这里将纪传体正史喻为统领史部十五类的大纲,极为恰当,道出了史部典籍及史部目录的发展与纪传体正史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不仅限于史部)。

《史记》与中国目录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分类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这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项重要功能。《史记》相当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迁对各种学术流派、社会现象和事物性质的辨析考察。这种辨析考察与叙述方法,对目录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司马迁对《史记》一书门类的设置,有不少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结果。例如,《史记·儒林列传》是一部经学简史,司马迁在列传的综述中,对经学的产生、发展作了一个扼要回顾。他将经学史分为五个阶段:“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为第一个阶段,即创始阶段;“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为经学的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及至秦之季也焚《诗》、《书》,坑术士,《六经》从此缺焉”为涵学的第三个阶段,即停滞或受挫的阶段;“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时, 颇征用,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至孝景, 不任儒者, 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故诸术博士官具官待问, 未有进者”, 此为经学的第四个阶段, 即复苏(或中兴)阶段; 汉武帝即位, “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 而上亦乡之, 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及窦太后崩, 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此为经学的第五个阶段, 即鼎盛阶段。上述分析, 言简义赅, 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汉武帝以前经学发展的轨迹。接下来, 司马迁又以经学的传受人物为线索, 对当时五经的传播与发展作了介绍。

司马迁关于经学发展的这些经典论述, 被后代包括目录学家在内的学者奉为圭臬, 并经常加以引用。如《汉书·艺文志》等目录学著作中有关五经的叙述, 就依此为模式, 甚至整句整段地搬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求渊源、考流变的意识非常强烈, 如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述其各篇宗旨时, 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礼书》: “维三代之礼, 所损益各殊务, 然要以近性情, 通王道, 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 略协古今之变”。《乐书》: “《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 人情之所感, 远俗则怀, 比《乐书》以述来古”。《律书》: “《司马法》所从来尚矣, 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切近世, 极人变”。《孔子世家》: “仲尼悼礼废乐崩, 追修经术, 以达王道”, “为天下制仪法, 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司马穰苴列传》: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 穰苴能申明之”。《扁鹊仓公列传》: “扁鹊言医, 为方者宗, 守数精明, 后世循序, 弗能易也, 而仓公可谓近之矣”。而最能体现其求渊源、考流变思想的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小序中的一段话: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王迹所兴, 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 论考之行事, 略推三代, 录秦汉, 上记轩辕, 下至于兹, 著十二本纪, 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 年差月明, 作十

表。礼乐损益, 律历改易, 兵权山川鬼神, 天人之际, 承敝通变, 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 三十辐共一毂, 运行无穷, 辅拂股肱之臣配焉, 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 作三十世家。扶义俟, 不令己失时, 立功名于天下, 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

上述所言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实为司马迁对人类社会分类目、考源流之大纲, 全书五十二万余字就是以此为脉络铺叙而成。也只有这样, 司马迁才能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方方面面, 有条不紊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实际上, 《史记》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其分类目、考源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应该说, 从《史记》一书中, 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分类之应用, 始于事物, 中于学术, 终于图书”的客观规律。

此外, 《史记》对中国古典目录学体制及表述方式也有重大影响。

首先, 《史记》创立了比较完善的一书目录。过去, 一般认为一书目录肇始于《周易·序卦传》, 《史记》等序目皆仿此而作。如清人卢文弨说: “吾以为《易》之《序卦传》, 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歟? 史汉诸序, 殆昉于此”。但严格地说, 《序卦传》所罗列的既不是《周易》全部内容的目录, 也没有排列序号, 至多具备了目录的刍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仅详列各篇篇名与序号, 而且还使用了二级目录。其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为一级目录, 即“章”; 其下之内容, 如“夏本纪第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律书第三”、“吴世家第一”、“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等为二级目录, 相当于章下之节。这种目录泾渭分明, 条分缕析, 不仅能通过它了解全书的概况, 还可方便检索。

其次, 《史记》的篇目提要, 为后世的书目解题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解题即书录, 或称提要。它的主要作用是介绍图书编纂宗旨、内容概要, 以方便读者阅览。《史》(下转第 58 页)

多媒体信息网,开展“好读者、好馆员”评选活动等,都收到很好的成效。

第三,弘扬图书馆精神,构建新世纪图书馆人的精神风貌。21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希望主要在于对图书馆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在于构建新世纪图书馆人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就是敬业爱业、无私奉献的思想,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的志向,不怕困难、敢于拼搏的干劲和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必须在我们的队伍中来一场广泛深入的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奋发精神,鼓舞斗志,为跨世纪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必须切实改善图书馆工作条件和职工生活福利待遇,尽量多给大家一点好处,以增大图书馆的吸引力,稳定队伍和人心。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信息化地位作用

及中国信息化进程 香港经济导报周刊 1997-11-03

- 2 陈曙 论西方信息产业基础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5, (4)
- 3 黄俊贵 图书馆的转型与发展散论 第五届全国省、市公共图书馆馆长会议论文, 1997-05
- 4 程焕文 光荣与梦想: 二十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展望 图书馆, 1994, (3)
- 5 林汉城 大力推进我国基层图书馆跨世纪的知识工程建设 见: 中国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 6 文化部计划财务司 中国文化文物事业统计年鉴 1996

林汉城 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图书馆。邮编 515500。

(来稿时间: 1998 1 13。编发者: 刘喜申)

(上接第23页) 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全书一百三十篇均作了提要。这虽然是篇目提要,但与书目提要的性质却是相同的。如《周本纪》,司马迁写道:“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短短数语,点明了周先人创业,西伯兴起,武王强盛,到幽厉中衰,直至赧王国灭的历史过程。又如《孔子世家》的提要:“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这里,司马迁叙述了孔子生活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烘托出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为天下制仪法”的不朽功绩,是一篇精彩的内容提要。

当然,完整的书目解题还应包含作者及版本等方面的内容。对此,司马迁在叙述一百三十篇篇目之前,对自己的身世、学术渊源、修撰《史记》的动机和经历作了详细介绍;关

于版本流传情况,司马迁则明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可见,书目解题的几个要素,《史记》也已经基本具备了。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一部重要典籍,是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 1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分类篇
- 2 孟子·尽心
- 3 [唐]刘知几 史通·编次
- 4 [唐]刘知几 史通·杂说上
- 5 [唐]刘知几 史通·二体
- 6, 7 [汉]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
- 8 [清]卢文弨 钟山札记,卷四

徐蜀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通讯地址: 北京文津街7号。邮编 100034。

(来稿时间: 1997 12 30。编发者: 翟凤岐)